

·非遗撷珍· 西部民歌乐府——两当号子

□李跃宏

位于甘肃“东南门户”小陇山里的两当县自古以来是出甘入陕通川的必经要道,又地处长江流域嘉陵江水系,因为具有一定的地理区位优势,境内道故川红崖河畔的杨店古镇成为“南茶北盐”的集散地,历代有“旱码头”之称。自北宋以来设立山南道,既是官道又是商道,也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通道。独秀一枝的“两当号子”可谓是西北民歌中特有的一种民间艺术,虽然出产自北方却有浓郁的南国之音,可见具有独到的艺术风格,所以自古拥有“西北民歌乐府”的称号。两当号子主要流行于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后裔聚集区嘉陵江以南深山林区的站儿巷、云坪、泰山、广金等乡镇,时至今日民间音乐号子仍是人们传递情感抒发胸臆的一种艺术方式。“两当号子”曲调优美高亢、音域宽广、节奏明快,粗犷而极富变化。从古到今一直是当地群众“湖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的统称)遗民喜闻乐见,自娱自乐的传统民间艺术表演形式。两当号子的曲调主要有羽、徵、商三种调式,不同的曲调表达不同的情感。曲体结构目前流行的有一段体,两段体和三段体,曲调旋律幅度跳跃较大,演唱时的表现力不但强烈,而且音域丰富,还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具有悠久历史的两当号子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我省著名的民乐专家邱作人、周健等人在县文化馆民乐学者索象武及爱好者一同经过多年的普查搜集,几代人的呕心沥血将两当号子分类整理成册,他们一行走遍了嘉陵江和汉水两大流域的村村寨寨、家家户户,大家围着火塘旁边录音边记了上千首民歌,曲牌更是多达十几个种类。他们从中逐一筛选整理出有艺术价值的民歌262首,其中两当号子63首。

两当号子主要有“花号子”和“排号子”两种。“花号子”曲调高亢、音域宽广、旋律跳跃的幅度大,音域变化多,没有唱词,只有“噢、哟、哎、咳、啊、呀”等虚词,在民间演唱的曲目较多,在流传区域较为普及。“花号子”又可分为“喇叭号子”和“鸡公号子”两种。所谓的“喇叭号子”就是民歌手用声音模仿喇叭吹奏的音调而演唱的号子。比如在两当县嘉陵江南部深山林区流传甚广的《大喇叭号子》《画眉鸟儿跳上架》等著名曲目。

另外一种流传甚广的两当号子曲调就是民歌手模拟公鸡的声音来演唱的号子,可分为独唱、对唱、领唱、齐唱、多声部合唱等表演形式。在当地流行最为著名的曲目有《大鸡公号子》和《生鸡公号子》等。广受欢迎的“鸡公号子”的对唱表演极为有趣,参加对抗的双方男女歌手站在遥遥相望的山坡上,一问一答的对唱,有时连续几天的轮换对唱打擂台。这种拉锯战式的比赛直到有一方被对方歌手的唱词问得张口结舌主动表示认输时才握手言和方罢休,其情景最类似电影《刘三姐》中的场面。

还有两当号子中的另一种曲调“排号子”一般都有唱词,演唱的歌词大多是即兴编唱的,因为歌词对仗押韵,所以唱起来琅琅上口,曲调比“花号子”要低一些,旋律幅度的跳跃也变化较小,在民间音乐流行区域也是最为普及的号子曲目之一。“排号子”可分为“拉箱夫号子”和“山歌套号子”两种形式。排号子的特点一般都和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自明清以来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外地客商在嘉陵江和汉水分水岭的大阳山地区发现了富铁矿,他们在广金乡的大山林里开办了许多的炼铁厂和采铁矿,至今遗址保存完好的有东河铁厂、松坪村的漆园子铁厂、龙王庙倒江寺采铁矿、响水村的钢厂坪炼铁厂等,据考证大多是毗邻的徽县、汉中富户的商号,也有湖北四川等地的开发商。当时的生产工艺都很原始,采矿和冶炼过程中,为了解决通风这个关键的技术问题,需要直径很大的风箱向采矿洞内和炼铁炉里鼓风,风箱往往需要四至六人同时合力推拉。于是“拉箱夫号子”便应运而生了。这类曲牌的号子现在仅幸存几首,成了所有号子中的珍品,具有代表性作品目前收录于《两当民歌集成》一书收录的仅有《箱夫子歌》等三首。

特色鲜明的“山歌套号子”是当地歌手在长期的民间演唱活动中逐渐积累产生的。其曲调既不同于陕南号子和当地“唐将班”的打锣鼓草,也不同于云贵川一带的川江号子和薹草号子,自成一体就是地地道道的两当号子,可以说是两当号子中一个与众不同的流派。

追溯两当号子的历史可溯源远流长,自唐宋以来号子成为民间音乐广为流传。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里,为了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在劳动中人们把山歌中的词和号子的曲调进行了艺术嫁接,将多种唱腔融为一体,解放前广为流行的“花号子”曲调就是由此而产生。比如《久不唱歌忘了歌》《三根竹竿长上天》一类的“排号子”曲调也是这样加工而成的。“两当号子”的演唱形式不拘一格,朴实生动。民间表演习惯上以锣鼓为伴奏乐队,一般由四至六人组成并有锣鼓等传统民族乐器,演唱时以齐唱为主要表演形式。值得一提的是两当号子的演唱过程中特别注重第一歌手和第二歌手之间的“接气”,即就是第一组歌手唱完第一句要换气时,第二组歌手要不失时机的从这一句的末尾拖腔处接唱,前后配合默契,除了音色上的变化有区别之外,上句和下句换气相接的过程可以说没有时间差的感觉,有着一气呵成的艺术效果。演唱号子除了以上表演形式之外还有领唱、对唱和八度和声等艺术表演形式。

两当号子1957年赴北京参加全国民间音乐汇演,令人欣慰的是古老的民间艺术精品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在首都天坛和长安两大剧院“唱”(当地人把唱称为唱)了起来,先后演出15场。民歌王张升、袁正等有等民间歌手还为毛主席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唱号子,受到了赞扬。与时俱进的民间艺术铁树开花,推陈出新的众多号子中《丰收号子飞满天》多次参加汇演屡获殊荣,成为号子作品中的代表作。如今的两当号子已经荣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了有效保护和重视,得到了传承发扬。

王以哲 东北军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冰行者

□董勇

王以哲,字鼎芳,黑龙江宾县人,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张学良的亲信部属。1936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陆军步兵第十九师中将师长兼第七旅旅长、第六十七军军长等职务。这位在历史洪流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东北军将领,以其坚定的信念和英勇的行动,成为东北军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冰行者。在山城堡战役中,他率领的第六十七军积极配合红军,给国民党军以决定性的打击,有效制止了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对中共夺取军事政治主动、争取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内和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4年,卫立煌和陈继承率领的“中央军”因“围剿”红军无功而退。继他们之后来河南、湖北“围剿”的就是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何柱国的第五十七军及第五十三军下属刘多荃的一〇五师等东北军部队,其中,第六十七军首先进入了大别山区。

红二十五军的对头就是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从包围大别山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开始,长征途中一路尾随直至陕北。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根据日本加紧侵华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同时,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1936年初,张学良在洛川设立“西北剿总前进指挥所”,与王以哲商讨东北军的去留大计后,密托王以哲

设法沟通与红军的联系。王以哲出身于东北军,在那个动荡不安、民族危亡的年代,他怀揣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沉热爱。“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王以哲内心的悲愤与不甘愈发强烈。他深知,要拯救民族于水火,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月25日,王以哲在洛川城内柳营会见了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苏维埃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等,双方就红军与第六十七军局部合作达成口头协议:在政治上,王以哲赞同红军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军事上,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在经济上恢复红白区通商。这是红军和东北军的第一个停战互助协定。

王以哲驻洛川期间,积极与中共方面接触,摒弃了过去的偏见与隔阂,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推动东北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同时受中共抗日救亡主张的影响,在第六十七军安排下掩护了不少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地下党员孙达生,经杜仲远、高崇民介绍,由上海赴西安到东北军工作,受到王以哲的热情接待。王以哲委任孙达生为秘书(少校军衔),为掩护孙达生在东北军中工作提供了各种方便。王以哲又应中共地下党的要求,把从北平、天津来的20余名进步学生(其中有的是秘密党员)接到洛川,安排在第六十七军教导队中,向部下灌输抗日思想,为第六十七军注入新鲜血液。

在王以哲的努力下,东北军与中共之间的沟通渠道逐渐畅通。双方

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的行动如同破冰之锤,打破了曾经的坚冰,让合作的暖流在双方之间流淌。王以哲和共产党人多次秘密,愈来愈看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真正的抗日力量,认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和威力,所以积极为促进西北大联合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竭尽全力。

1936年3月,王以哲陪同张学良与李克农、钱之光会晤,会商约定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张学良进一步商谈。4月,王以哲又陪张学良赴延安与周恩来举行了著名的“肤施会谈”。双方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探讨逼蒋抗日之可能,并就两军停战、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达成协议。

1936年7月,王以哲由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毛泽东亲笔致函王以哲,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与南京政府谈判的情况,并就蒋介石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的信息提醒张学良、王以哲“严密警戒”。毛泽东指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一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红军必须以全力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实行者……”从此,王以哲率领的第六十七军和红军关系更加密切,成为真正的友军,相互认可,默契配合。(连载一)

·陇道遗珍·

通渭战国秦青铜矛

□刘小农

通渭县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青铜矛,长14.5厘米,宽3.2厘米,为传世旧藏。矛首为箭簇状,鏃部束腰,鏃中部有圆形穿孔以为固柄之用。矛首略秃,两侧有血槽,使用痕迹明显。此件矛与陕西秦始皇兵马俑一号俑坑出土青铜矛极为相似,从器型、铭文风格断定,为战国秦青铜矛。矛鏃下端阴刻二字,为铸作地和工匠姓名。《吕氏春秋·孟冬纪》:“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是秦代的“物勒工名”制度,即在器物上刻上制作地和工人的姓名,终秦一代一直存在,为汉代所继承并不断完善。

二字单线阴刻,一倒一顺,为战国秦系文字。其一为“冀”,一未识。2021年笔者在编《通渭金石辑考》时,释其一为“牀”,并作了简单释读:“从木,并(pan)声,同‘床’,今统一规范为‘床’,在用作姓时仍作‘牀’。牀的正常写法左月右木,矛上所刻左木右月,金文结构随意,多有偏旁移位现象。”

冀,作为古地名,最初在黄河以北今河北、山西一带,禹夏定九州时,称这一带为冀州。周时有冀小国,据史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为不道,入自颠軫,伐郟三门。’”杜预注:“冀,国名,平阳皮氏县东北有冀亭。”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原为魏地,秦昭襄王时为秦属皮氏县下一要镇。秦兵器多征用于县,故铜矛铭“冀”非指皮氏县之冀亭,当为秦武公时置之冀县,在今甘肃甘谷县境内。

2012—2014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位于甘谷县磐安镇毛家坪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有大夫级别贵族墓葬、车马坑,出土陶器、石器、

玉器、青铜器千余件,遗存丰富,把秦文化的编年推进到西周时期。

通渭毗邻甘谷,周时为襄戎地。襄戎所来,据历史学家何光岳《相人(襄人)的来源和迁徙》一文考,襄人为西羌的一支,起源于岷山南麓的襄阳城山,即今湖北襄阳一带。襄人一支西迁演变为戎人,乃襄戎。《汉书·地理志》平襄县,唐人颜师古引北凉学者阚骃注曰:“故襄戎邑也。”《九域志》:“平襄城,本汉县,属汉阳郡,故襄戎之邑。”

平襄,始见于《汉书·地理志》:“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曰填戎。明帝改曰汉阳。县十六:平襄,莽曰平相……”普遍认为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置天水郡治平襄,郡、县为同时建置,始有平襄之名。但是,平襄,字面理解就是平定襄戎之意。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筑长城以拒胡”,今通渭自西南至东北横穿全境90余千米,距离城区原平襄县治地最近处不到10千米。宝鸡文理学院教授彭曦在《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一书中写道:“总之,今通渭县的历史,应早于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置天水郡的时间,从战国秦长城的地理位置分析,今通渭县的历史源起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秦并戎国25城,有可能是原来戎族的居邑;二是与修筑长城同时建立。长城的修筑,必须有沿线城邑的支撑方可,这是极为显明的道理。所以,我们认为如临洮县、渭源县、首阳镇、静宁县、静南的李店、彭阳古城、镇原彭阳、环县、志丹县这些内侧的城邑,皆与修筑长城有必然关系,它们是长城修筑之初和筑成之后的重要支撑点,与长



城是一个体系。”秦昭襄王筑长城时在沿线修建城邑,用以长城防守后勤保障,平襄城为其中之一。经过150多年的发展,汉武帝置天水郡时,平襄城不仅是战略要地,经济、文化、建筑、交通亦渐具规模,无疑是郡治首选之地。

《秦文字编》《秦文字集证》(秦昭襄王)五十年诏事戈”摹本,其翼写法与此铭翼非常相近,可以确定为秦昭襄王时期。秦昭襄王筑长城,驻守将士使用武器,主要征用于冀。此铜矛即为筑长城时遗留,出土后传存至今。

冀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县之一,有关冀记载的实物资料并不多见,存世稀少。毛家坪遗址证实了西周时期甘谷县境内秦文化存在,出土“子车戈”有“秦公作子车用,敬美武灵戴威不廷”14字铭文,但未见有“冀”实物。《秦文字编》收录“冀丞之印”(1315页),为冀县丞官印实证。1995年在位于秦始皇陵以北3—5公里刘寨村出土一批秦代陶片、瓦片,多有陶文戳记,其中有“冀”字(《秦文字集证》546页),为来自冀“物勒工名”之物。除此而外,未见有著录。

“五十年诏事戈”最初见于1997年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吉林大学吴振武《武陵新见古兵三十六器集录》一文,武陵为秦置县,在今湖北竹山县。目前见于记载有“冀”铭文器物,“五十年诏事戈”而外,此为仅见。

·丝路文化·

今昔扁都口

□张天雁

大斗军,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派遗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镇守扁都口,因防守有功,升为左卫将军;清代设置察汗俄博营,并于清康熙四年(1665年),在俄博营北山砌立《甘州府俄博营》界碑;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增兵500名于大马营,以扼守扁都口要隘。

扁都口也是古丝绸之路之上连接“青海道”与“河西道”的重要节点。丝绸之路的“青海道”由长安出发,沿渭河西行,经陕西宝鸡,过安葬关(今陕西陇县西),行经甘肃天水、陇西、临洮、临夏,西行越黄河,经青海海和、西宁、大通、俄博、过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深入匈奴驻地千余里,大败浑邪王、休屠王,河西从此归入汉朝版图。东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三年(399年),高僧法显从长安出发,经靖远、兰州、西宁、乐都、大通、门源、翻越祁连山,出扁都口到张掖,沿丝绸之路西行,前往西域至天竺(今印度)求法取经。隋炀帝杨广大业

都口更是汉、羌、匈奴、突厥、回鹘、吐谷浑、吐蕃等民族相联系的重要渠道,是农、牧商业活动的必经之路。青海北部的游牧民族,通过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进行物资交流和贸易,特别是清顺治八年(1651年),甘肃总兵张勇开茶马互市于洪水之后,扁都口在物资交流方面的作用更显得重要。扁都口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南通河湟,北达甘凉的险关要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3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精兵出陇西,过浩门(今青海大通西),经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深入匈奴驻地千余里,大败浑邪王、休屠王,河西从此归入汉朝版图。东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三年(399年),高僧法显从长安出发,经靖远、兰州、西宁、乐都、大通、门源、翻越祁连山,出扁都口到张掖,沿丝绸之路西行,前往西域至天竺(今印度)求法取经。隋炀帝杨广大业

“扁都隘口气萧萧,鱼贯行来溪嶂深。暗叱戎公风烈烈,凄迷隋帝雨淋淋。巢车好上龙山望,毳幕休教鹿坞侵。艳说凯歌劳卫国,皇华摇曳碧云岑。”这是清代郝道写的《大斗拔谷》诗,诗中的“扁都隘口”,是指位于民乐县城南的扁都口。

扁都口,古代称大斗拔谷,也叫达斗拔谷、大斗谷,位于祁连山中段,高大险峻的祁连山被东西劈开,形成了一个贯通南北的峰口,这就是被称为险关要隘的扁都口。扁都口,为藏语“扁麻多”,意为金露梅,海拔3500多米,南通青海祁连山峡堡堡,北达甘肃民乐县炒面庄,南北长约30公里,最宽处不足200米,最窄处仅15米,其两山夹峙,峡谷深邃,山势峻峭,峭壁突兀,地势险要,是河西走廊重要门户,有一关当夫,万夫莫开之势。在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在扁都口及其附近修筑营盘、设置关卡,派兵防守。汉武帝刘彻元鼎六年(前111年),在氐池(今民乐县)设置护羌校尉,派兵5千驻守;东晋穆帝司马聃永和六年(350年),在祁连山中设置汉阳县,镇守扁都口;唐初,设置赤水守尉,旋置大斗军隶武威郡,扼守扁都口,防止吐谷浑、吐蕃北上,保护西域通道;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七年(634年),契苾何力曾一度驻守扁都口;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四年(726年),吐蕃悉罗罗出兵扁都口,北犯张掖,被河西节度使王君奭击败;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年),设置

五年(609年)三月,隋炀帝西巡,出扁都口抵达张掖,召开万国博览会。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年),金吾将军杜宾客与吐蕃军队激战扁都口,大获全胜。南宋理宗赵昀庆元三年(1227),成吉思汗率蒙古军队从扁都口进入青海,占领青海北部地区。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五年(1642年),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的部将贺锦功占张掖后,率领起义军穿越扁都口,进军西宁。清康熙年间,青海蒙古厄鲁特部怀阿尔赖出扁都口,侵占大马营滩(今山丹县焉支山下),被王进宝击溃。清同治年间,回民数次起义,均从扁都口出,与清军交战。1929年,马仲英部由扁都口出,甘凉卫戍司令部步兵连连任元奎力竭战死,占据张掖。1931年4月,青海马步芳的军队由扁都口出,与张被国民党马步英部激战于三堡(今民乐县三堡镇),马步英败走酒泉。1934年,上海《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考察西北,也是经西宁,出扁都口,而后到张掖。1937年9月,红西路军征战河西失利之后,被俘的红军将领刘瑞龙、董光益、魏传统、刘静生、阮正明、徐宏才、孙玉清、惠子时以及数千名被俘的红西路军战士,从张掖押解到扁都口,也是从扁都口行走的。1949年9月,西宁解放之后,王震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五师数万大军从西宁出发,翻祁连山,出扁都口,解放了河西张掖、酒泉等地,继而从河西挺进,解放新疆。